

Status and Trends of Local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Based on CSSCI Journal Articles from 2017—2023

Lv Zhuoru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papers with the them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 source journals of CSSCI from 2017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view, topics and methods. The study found that,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there are limited high-quality journals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related researches is relatively large, but the quality varies. At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both “communication in health” and “communication in health” have received common attention.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s still dominated by Western theoretical models,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in order to build a “knowledge increment”. To summarize, China's future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crossroads”, insisting on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ocusing on “health promotion”,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driven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and bearing in mind “the greatness of the nation”, balancing global vision and local practice.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y China; Indigen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国本土健康传播研究现状与趋势

——基于2017—2023年CSSCI期刊文章

吕卓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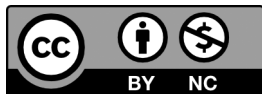
摘要：本文以2017年至2023年收录于CSSCI正式来源期刊中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从概况、议题、方法等方面深入了解“健康中国”背景下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现状。研究发现，本体论层面，国内健康传播研究优质期刊资源有限，相关研究“量多质少”；认识论层面，“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均得到共同关注；方法论层面，理论视角来看，西方理论模型仍占主导地位，应以综合研究，构建“知识增量”。综上，面向未来的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应立足“十字路口”，坚持学科融合与理论创新；着眼“健康促进”，强化技术驱动与应用探索；心怀“国之大者”，平衡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

关键词：健康传播；健康中国；本土化；文献回顾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17年，“健康中国”战略在十九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我国人民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基础上，也越来越期待“生活得更好”。2019年，Covid-19的大流行使卫生健康传播成为全

球应对这场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媒介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中的传播运动、健康呈现、危机传播、技术运用等议题不仅呈现出独特的实际运用价值，而且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实践引导功能^①。2022 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并将“建成健康中国”作为到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以上种种，使得“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逐渐成为我国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新星。

陈虹（2013）作为较早一批系统梳理我国健康传播学术发展脉络的学者，通过分析 1992—2011 年我国大陆健康传播的研究文献，发现虽然传播学者缺席的局面得到改善，但学科交叉研究依然滞后^②。金恒江（2016）通过梳理九本新闻传播学类 CSSCI 期刊在 2000 年至 2016 年刊发的健康传播相关论文发现，我国大陆对健康传播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如论文基数少、研究不规范、理论基础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③。余榕（2018）借助 CiteSpace 对 1992—2017 年被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健康传播研究论文进行分析，认为现象描述、个案探讨、理论挖掘是当前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④。孙少晶（2018）结合语义分析、内容分析，对 1987—2016 年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健康传播相关论文进行梳理，认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对理论建构与新技术的关注不足^⑤。常松（2021）通过梳理发表在 2020 年前、并被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所有健康传播相关论文，认为未来我国健康传播应聚焦互联网健康、老年人群，提高健康传播的专业化发展^⑥。宋宝玥（2023）运用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中 2005 年至 2022 年间与健康传播领域相关的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指出 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成为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新拐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体表现、健康信息传播效果等也成为健康传播的研究热点^⑦。

健康传播是一个受到特定文化、社会和健康背景影响的研究领域^⑧。尽管近年来我国健康传播领域相关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关于健康传播和推广的现有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仍然植根于西方思想和西方社会，更多的重要优秀论文也被发表于国际期刊，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外流严重，既不利于中国本土化健康传播理论的构建，也不利于我国健康传播学术研究影响力的提升。

① 姜海. 走进“健康传播”新时代 [J]. 中国出版, 2018 (3): 1.

② 陈虹, 梁俊民. 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C]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等. 第八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文集. 2013: 18.

③ 金恒江, 聂静虹, 张国良.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 谁做什么? 引用谁和被谁引用?——以九本新闻传播类期刊收录的论文为例 (2000—2016)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7, 38 (9): 151-158.

④ 余榕. 我国健康传播研究进路与前沿态势的可视化分析 [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 (1): 250-256.

⑤ 孙少晶, 陈怡蓓. 学科轨迹和议题谱系: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三十年 [J]. 新闻大学, 2018 (3): 84-97, 150.

⑥ 常松, 王慧. 我国健康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趋势 [J]. 当代传播, 2021 (2): 48-50.

⑦ 宋宝玥. 我国健康传播的研究主题与热点变迁——基于 CNKI 期刊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J]. 新闻世界, 2023 (12): 46-49.

⑧ Hornik R.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Making Sense of Contradictory Evidence [M] // In L D Singhal, M J Cody, E M Rogers, et al. Entertainment-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Hist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02: 19-32.

基于此,本文以2017年以来发表在CSSCI正式来源期刊中的健康传播相关论文为个案,以期通过对我国核心期刊中健康传播研究的考察,分析其在研究方法、议题选择、热点关注、理论应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而关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体现的健康实践,对如何提升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影响力进行反思与展望。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的筛选步骤如下:(1)进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的“高级检索”页面,以“健康传播”为主题、2017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为发表时间范围进行搜索,共得到2363条检索结果。其中,学术期刊1308篇,学位论文842篇,会议文献107篇,报纸13篇,学术辑刊30篇,特色期刊61篇。(2)对1308篇学术期刊文献进行进一步筛选,其中228篇为CSSCI来源期刊(2021—2022)。(3)进一步梳理文献的期刊来源,剔除91篇CSSCI扩展版文献、2篇“主持人语”(均收录于《新闻大学》)、2篇中国年度传播学研究(作者系《国际新闻界课题组》且收录于《国际新闻界》)、1篇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收录于《新闻记者》)、1篇研讨会综述(收录于《电子政务》),选择剩下的131篇CSSCI(2021—2022)来源期刊作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

(二) 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使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并使用Excel、SPSS与KH coder作为文献分析的主要工具。其中,Excel主要用于文献筛选与编码,SPSS主要用于统计与分析,KH coder主要用于关键词的词频进行提取与可视化呈现。

其中,论文的“发表时间”“文献来源”“项目基金”直接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导出。“作者信息”包括作者数量、第一作者职称、作者单位。“理论基础”从论文中人工抓取。

“研究议题”借鉴张自力(2003)对健康传播研究方向的划分,分为:(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3)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如医患关系研究);(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与文化研究;(6)艾滋病、安乐死、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7)健康传播史的研究;(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危机传播研究;(8)健康传播中新技术的应用研究;(9)其他^①。

^①张自力. 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3): 42-48, 94.

“媒介选择”细分为报纸、电视、社交媒体、其他（诸如杂志、商业网站等）四类^①。

“研究方法”编码参考陈虹、梁俊民（2013）对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分析，将其分为：（1）个案分析；（2）文本分析；（3）访谈法；（4）观察与实地考察法 /（网络）民族志；（5）业务探讨；（6）问卷调查法；（7）内容分析；（8）实验法；（9）抽样调查法；（10）文献计量法这十种方式^②，并认为前五种为质性研究，后五种为量化研究；除此以外，设立“（11）其他”作为第十一项编码，收录诸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社会网络分析（SNA）等研究方法。

在编码完成后，借助 Excel 的 Random 函数对微博数据进行随机编号，再用 Excel 随机从中抽取 10% 的样本，使用 Poe AI 进行再编码，并用 SPSS 对两次编码结果进行可靠性检验，所得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 0.912，由此认为编码具有较高的信度。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整体概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知网期刊中文数据库共收录 2136 篇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如图 1 所示，其中 2017 年 118 篇，2018 年 165 篇，2019 年 171 篇，2020 年 249 篇，2021 年 194 篇，2022 年 225 篇，2023 年 182 篇。Covid-19 的暴发也使国内健康传播研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研究论文快速增长、研究话题也愈加丰富。但这一阶段，CSSCI 期刊中的健康传播相关研究并没有呈现出期望中的繁荣景象，2017 年全年，仅 13 篇健康传播相关研究论文被 CSSCI 期刊刊发，2018 年刊发量为 18 篇，2019 年至 2022 年，分别有 21、21、22、21 篇健康传播主题论文发表在 CSSCI 期刊中，稳定在 20 篇左右，但 2023 年，又回落至 15 篇。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学者对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逐渐趋于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健康传播研究仍然没有实现“质”的突破，高质量论文较少，亟需优秀的研究成果推动整体发展与学科建设。

① 金恒江，聂静虹，张国良.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谁做什么？引用谁和被谁引用？——以九本新闻传播类期刊收录的论文为例（2000—2016）[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9）：151—158.

② 陈虹，梁俊民. 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C]//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 第八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文集，201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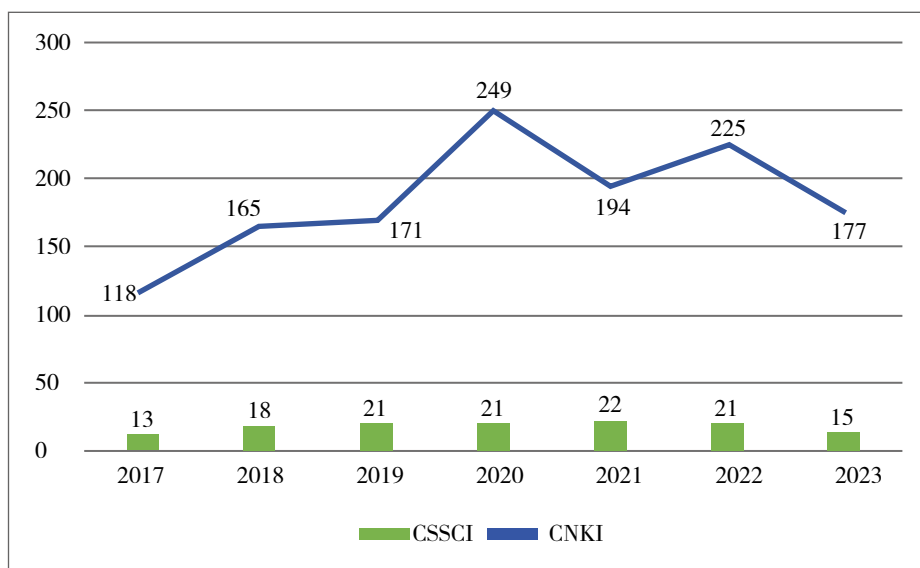


图1 2017—2023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相关文献数量统计图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CSSCI-related literature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2017—2023

如表1所示,从第一作者职称来看,131篇样本中,“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最多(35.1%),“副教授”次之(25.2%),讲师(8.4%)与在读博士(8.4%)紧随其后。即使是“其他”类别,也多为“研究员”“副研究员”。这表明,在健康传播领域,CSSCI期刊对于第一作者的职称有一定的期待,留给青年学者的空间较小。

表1 2017—2023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第一作者职称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first author titles of Chinese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SSCI), 2017—2023

第一作者职称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在读博士	其他
频数	46	33	11	11	30
百分比	35.1%	25.2%	8.4%	8.4%	22.9%

如表2所示,作者工作单位方面,列出发文量前10的工作单位。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发文量排名前三,偏理工类的电子科技大学以及较为年轻的深圳大学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也有着不凡表现。

具体来看排名前五位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发文期刊相对分散,4篇发表于《新闻大学》,3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篇发表于《新闻界》,1篇发表于《编辑之友》,1篇发表于《湖

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 篇发表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 篇发表于《新闻记者》。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文章刊发同样较为分散，前者的 8 篇文章刊发于 7 种不同期刊，后者的 6 篇文章刊发于 6 种不同期刊。

与之相比，武汉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的论文刊发更为集中，武汉大学 2017—2023 年收录于 CSSCI 期刊中的健康传播论文有一半刊发于《新闻大学》；中国传播大学发表的 7 篇论文中，有 5 篇发表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表 2 2017—2023 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第一作者工作单位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s of first authors' work units in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SSCI), 2017—2023

排名	单位	篇数	排名	单位	篇数
1	北京师范大学	13	6	深圳大学	5
2	武汉大学	8	6	清华大学	5
2	南京大学	8	9	四川大学	4
4	中国传媒大学	7	9	中山大学	4
5	中国人民大学	6	9	厦门大学	4
6	电子科技大学	5	9	北京大学	4

如表 3 所示，在基金方面，131 篇样本中，47 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35.9%），17 篇获得省市基金项目资助（13.0%），14 篇获得高校基金项目资助（10.7%），仅 33 篇未取得任何基金资助（25.2%）。由此说明，发表在 CSSCI 期刊的健康传播研究成果大多均受到了国家、省市，以及高校层面的关注。

表 3 2017—2023 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基金级别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s of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SSCI) fund levels, 2017—2023

基金级别	国家社科	教育部	省市级	高校	其他	无
频数	47	11	17	14	9	33
百分比	35.9%	8.4%	13.0%	10.7%	6.9%	25.2%

如表 4 所示，在 131 篇样本论文中，共 44 篇刊发于国内新闻传播学“四大刊”^①，占比 33.59%。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7 篇，《国际新闻界》11 篇，《新闻大学》13 篇，《现代传

① 樊亚平，张璐. 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新闻传播学四大刊为中心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4）：148-160.

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3篇。相较而言,《新闻与传播研究》对健康传播的关注起步较晚,相对较少,但后续有加大关注的趋势。其余三大刊发文量相近,无较大差异。

表4 2017—2023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研究方法逐年统计表

Table 4 Year-by-year statistic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y (CSSCI), 2017—2023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新闻与传播研究》	0	1	1	2	0	0	3	7
《国际新闻界》	2	0	4	1	2	1	1	11
《新闻大学》	1	1	2	1	3	4	1	13
《现代传播》	2	3	2	2	1	1	2	13
总计	5	5	9	6	6	6	7	44

(二) 研究方法

如表5所示,对131篇论文文献中的研究方法进行简单分类和归纳,发现量化成为最主要的方法(51篇,38.9%),其次为思辨(47篇,35.9%),再次是质性(25篇,19.1%),最后少部分采用量化质性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法(8篇,6.1%)。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化方法与思辨方法旗鼓相当,但是思辨研究呈现出下降趋势;量化研究在2020年疫情前后数量达到小高潮,随后下降;质性研究随着方法论的完善略有增多;质数量化的综合运用在2021年以后逐渐被学界重视,呈现出发展态势。

表5 2017—2023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研究方法逐年统计表

Table 5 Year-by-year statistic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y (CSSCI), 2017—2023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思辨	6	8	9	8	8	5	3	47
质性	1	3	3	2	5	6	5	25
量化	6	7	8	11	7	8	4	51
综合	0	0	1	0	2	2	3	8
总计	13	18	21	21	22	21	15	131

如表6所示,问卷调查(22篇,16.79%)是最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内容分析(12篇,9.16%)、抽样调查(6篇,4.58%)、实验法(5篇,3.82%)、社会网络分析(4篇,3.05%)在量化研究中也较为常用。质性研究则常通过访谈法(12篇,9.16%)、观察与实地考察(5篇,3.82%)、业务探讨(4篇,3.05%)展开。这表明,问卷、访谈、内容分析,“三足鼎立”,成为CSSCI

较为认可的研究方法。

表 6 2017—2023 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 (CSSCI) 研究方法统计表

Table 6 Statistics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y (CSSCI), 2017—2023

研究方法	篇数	百分比	研究方法	篇数	百分比
个案分析	2	1.53%	问卷调查	22	16.79%
文本分析	4	3.05%	内容分析	12	9.16%
访谈法	12	9.16%	实验法	5	3.82%
观察与实地考察 / 民族志	5	3.82%	抽样调查	6	4.58%
业务探讨	4	3.05%	其他	10	7.63%

(三) 理论应用

如表 7 所示,对样本论文的理论应用进行分析后得出,131 篇论文中,应用理论的研究不到 30%,虽然与陈虹 2013 年的研究相比^①,国内学者已经更为注重研究中对理论的应用,但整体仍然较为缺乏理论层面的研究创新。

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 HBM) 是样本论文中运用最多的理论模型 (5 篇, 3.82%), 该模型认为健康信念是人们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的基础^②, 包括对疾病的感知 (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对行为的结局期望 (感知益处、感知障碍)、行动线索、自我效能及其他变量^③。使用健康信念模型的 5 篇样本论文中, 有 3 篇将健康信念模型作为中介变量, 分别考察传播渠道^④、社会支持^⑤、媒体接触^⑥ 对健康信念的预测作用, 进而探究其对疫苗接种、传染病防护等行为的影响。

除此以外, 知沟理论 (4 篇, 3.05%)、社会支持理论 (3 篇, 2.29%)、框架理论 (3 篇, 2.29%)、计划行为理论 (3 篇, 2.29%)、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M (3 篇, 2.29%) 也被较多

① 陈虹, 梁俊民. 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C]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等. 第八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文集, 2013: 18.

② Glanz K, Lew is R M, Rimer B K.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M]. San Francisco Calif, Jossey Bass Publishers, 1997: 41-59, 85-112.

③ 孙昕囊, 郭岩, 孙静. 健康信念模式与计划行为理论整合模型的验证 [J]. 北京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09, 41 (2): 129-134.

④ 王冬, 石曾萍. 传播渠道如何影响公众传染病防护行为?——以健康信念为中介的实证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30 (8): 63-79, 127.

⑤ 蒋晓丽, 钟棣冰. 在线信息支持会增强 HPV 疫苗接种意愿吗? ——一个基于健康信念的中介模型 [J]. 新闻与写作, 2022 (3): 79-88.

⑥ 郭小安, 王天翊. 新媒体接触、健康信念与 HPV 疫苗接种意向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 27 (6): 58-74, 127.

应用。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问题解决情境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传播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TCUM）、解释水平理论（CLT）等应用较少，可以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发展。

表7 2017—2023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理论应用统计表（前20）

Table 7 Statistics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SSCI) in China, 2017—2023 (Top 20)

理论 / 模型	篇数	百分比	理论 / 模型	篇数	百分比
健康信念模型	5	3.82%	传播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1	0.76%
知沟理论	4	3.05%	解释水平理论	1	0.76%
社会支持理论	3	2.29%	创新扩散理论	1	0.76%
框架理论	3	2.29%	规范性社会行为理论	1	0.76%
计划行为理论	3	2.29%	知信行模式（KAP）	1	0.76%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3	2.29%	意义建构理论	1	0.76%
社会认知理论	2	1.53%	劝服知识模型	1	0.76%
信息寻求综合模型	1	0.76%	公共关系对话理论	1	0.76%
问题解决情境理论	1	0.76%	保护动机理论	1	0.76%
生命历程理论	1	0.76%	技术接受模型	1	0.76%

（四）研究议题

对2017年至2023年，我国CSSCI正式期刊中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进行编码统计，如表8所示，结果表明，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18.3%）、健康教育与促进研究（18.3%）、健康传播学史（16.8%）研究，是前三大热点议题，三者共同占据了近年发表在CSSCI健康传播研究的半壁江山。

进一步梳理后发现，在归属于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的24篇样本论文中，14篇选择了社交媒体作为研究媒介（58.3%），4篇选择了电视（16.7%），1篇选择杂志（4.17%），1篇选择商业网站（4.17%），剩下4篇无明确研究媒介（16.7%）。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短视频的兴起，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大众分享日常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学界进行媒介研究与效果研究的重要载体。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一直是健康传播领域关注的重点议题，体现出较强的研究指导实践的现实价值。这一议题下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理论或模型展开，如框架理论（3篇，12.5%）、健康信念模型（3篇，12.5%）、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3篇，12.5%）等。该议题的研究范式多建立在西方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之上，亟需进行本土化建构。

与陈虹2013年的研究相比^①，近年来我国对健康传播外部环境与文化的相关研究有所增长

^① 陈虹，梁俊民. 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C]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 第八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文集，2013：18.

(9.2%)，更加开始关注中国本土健康传播实践的文化背景，但对于艾滋病、器官捐赠等特殊议题的研究呈现出下降趋势(2.3%)，人际传播(5.3%)、组织传播(3.8%)的相关研究也仍处于低位。

表 8 2017—2023 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 (CSSCI) 研究议题统计表

Table 8 Statistics of Chinese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SSCI) research topics, 2017—2023

研究议题	篇数	百分比	研究议题	篇数	百分比
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	24	18.3%	人际健康传播研究	7	5.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24	18.3%	新技术的应用研究	6	4.6%
健康传播史	22	16.8%	组织健康传播研究	5	3.8%
外部环境与文化研究	12	9.2%	特殊议题的研究	3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危机传播研究	11	8.4%	其他	17	13%

(五) 发展趋势

为进一步探究 2017 年至 2023 年，我国 CSSCI 正式期刊中健康传播的研究方向，使用 KH coder 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分词统计，本文仅选取了频度位于前二十四的词汇如表 9 所示。除“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以外，“信息”“社会”“公共”“卫生”“社交媒体”等高频词汇表示我国的健康传播更为关注社会场域中的健康信息传播情况；而“医学”“疫苗”“医疗”“风险”等词汇则表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中对医学领域健康促进的重视；此外，“体育”“出版”等行业也与健康传播研究相关联。

表 9 2017—2023 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 (CSSCI) 关键词词频统计

Table 9 Keyword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SSCI), 2017—2023

健康传播	86	传播	38	健康	36
信息	19	社会	19	公共	13
医学	12	卫生	12	健康中国	11
网络	11	叙事	10	媒介	10
理论	10	风险	10	疫苗	9
体育	8	行为	8	事件	7
社交媒体	6	关系	6	医患	6
分析	6	出版	6	医疗	6

如图 2 所示，使用 KH coder 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共现发现，2017 年至 2023 年，我国

CSSCI 正式期刊中的健康传播研究大致呈现出九大热门趋势：（1）基于健康叙事的沟通研究，如家庭、医患沟通等；（2）基于风险感知的疫苗接种研究；（3）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研究；（4）基于大众健康的行为研究，如全民健身等；（5）基于理论的传播学价值范式构建；（6）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健康运动研究，如优酷网“冰桶挑战”、微信运动等；（7）基于社会支持的网络分析研究；（8）“知识沟”在健康传播领域的蔓延；（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与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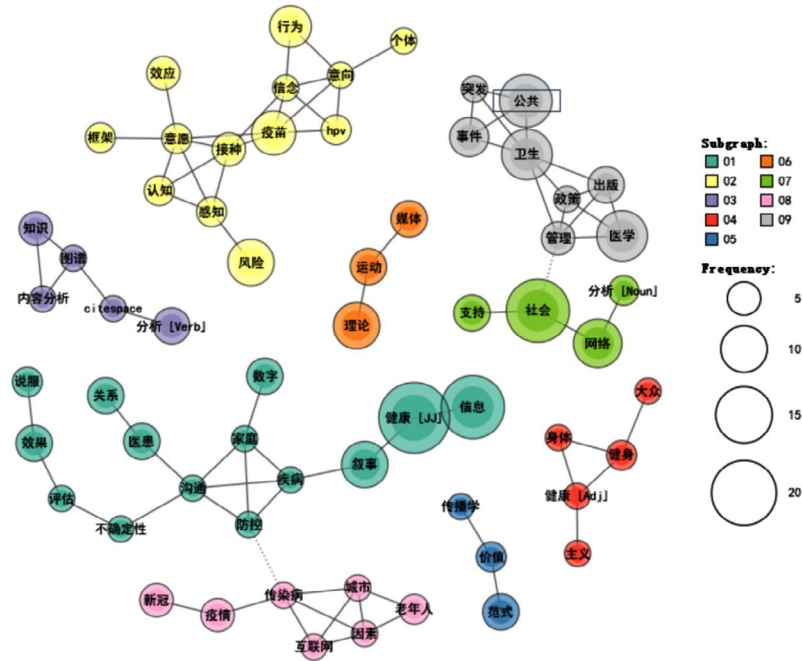


图2 2017—2023年中国健康传播研究CSSCI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

Figure 2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CSSCI-related literature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2017—2023

四、“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国本土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在对2017年至2023年，收录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且发表在CSSCI正式来源期刊的131篇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一）本体论：资源有限，量多质少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国内健康传播研究虽然取得了“量”的快速增长，已然弥补了21世纪初期我国健康传播领域研究缺失的局面^①，但发表在CSSCI期刊中的高质量论文仍然占

^① 韩纲. 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1): 64-69.

比较少,如图 1 所示,2017 年至 2023 年,CSSCI 刊发的健康传播论文分别占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健康传播论文整体的 11.02% (2017), 10.91% (2018), 12.28% (2019), 8.43% (2020), 11.34% (2021), 9.33% (2022), 8.24% (2023), 平均稳定在 10% 左右。由此可见,在“健康中国”提出初期以及 Covid-19 的暴发,激发了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热情,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研究质量,使得 CSSCI 收录占比超过了 10%,但近年来随着健康传播逐渐成为热点研究领域,研究数量随之不断增多,但高质量研究成果占比出现下降趋势,2023 年收录比仅 8.24%,降至七年来最低。国内健康传播相关研究仍需努力实现“质”的突破,提高高质量论文数量。

同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 131 篇样本中,仅 1/4 的论文没有得到任何基金支持,教授/副教授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占比过半。“无职称”“无职务”的青年人才,在核心期刊等学术资源的占有使用中仍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弱势群体^①,基于此,一方面,青年学者应着重锤炼自身学术功底、将科研实践与学术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另一方面,核心期刊也应加强与青年学者的交流,坚决破除唯资历、唯名位的论文选发弊端,给予青年学者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创造。

(二) 认识论: 共同关注“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

近年来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在议题选择方面更为注重应用导向。美国医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特劳斯曾将医学社会学这一交叉学科划分为“医学的社会学”和“医学中的社会学”,前者强调社会学,后者强调医学^②。我国学者张自力(2003)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康传播学同样可分为“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两个范畴^③,并认为前者考察人们与健康有关的行为和观念,并关照健康传播的各个层面,主要由职业传播学者进行偏重于基础性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由医疗健康领域的学者开展,偏重于普及健康理念、健康促进的应用性研究。

笔者通过梳理 2017 年至 2023 年我国 CSSCI 正式期刊中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发现,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18.3%)与健康教育与促进研究(18.3%)并列成为最热议题,“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均得到广泛关注。进一步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共现发现,医患沟通、疫苗接种、全民健康、社会支持与社交网络、新媒体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与治理等成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热点前沿。“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界线被逐渐模糊,更多的职业传播学者选择从事于医疗健康领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相关研究工作,即使是侧重于传播活动的“健康的传播学”也开始注重研究的应用性与可复性。

① 黄少成,赵姗姗,廖林雄,等. 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社科类核心期刊论文作者类群分布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4(5): 109-116.

② F D 沃林斯基. 健康社会学[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③ 张自力. “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J]. 现代传播, 2003(1): 50-52.

根据 Gary Kreps (2011) 的观点, 目前大部分健康传播研究仍未能有效整合并应用于当代的健康系统中, 并呼吁将健康传播研究的重心转向以证据为导向的健康措施、实践和政策, 以更好地推动健康传播的实际应用^①。我国的健康传播也应如此, 在未来研究议题的选择方面, 仍要以解决实际需求为导向, 体现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与实践意义。

(三) 方法论: 以综合研究, 构建“知识增量”

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观照, 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同样需要理论指导^②。从理论视角来看, 现阶段我国健康传播涉猎范围广、学科交叉性强。整体来看, 与1987年至2016年相比^③, 2017年至2023年健康传播的研究成果其理论指导更为多元、研究方法也更为明确, 尤其是健康信念模型(HBM)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并成为使用频次最高的理论。国内健康传播在注重宏观视野的同时也更为注重微观研究, 而中观层面的理论(如卫生机构组织理论)仍十分罕见。

与1987年至2016年相比, 思辨类论文占比下降, 该类论文多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表达作者个人的价值取向, 且往往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指导, 缺乏个案选择标准、样本概述、理论回溯等内容, 往往容易陷入对事物宏观特征的描述性总结。

与传播学的其他领域一样, 健康传播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健康传播现象、提出模糊的政策建议或限制于特定案例的讨论, 而是应该以是否为该领域带来了尚未被了解的新知识以及是否产生了知识增量来衡量其价值^④。因此, 在健康传播研究中, 将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同样十分必要。笔者梳理后发现, 虽然量化已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但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占比仍然较少, 且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访谈法仍是核心研究方法, 操作性虽强, 但多收集截面数据, 缺少时间历程与阶段回溯。

除此以外, 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因素也对我国健康实践和健康传播产生着深远影响, 但现阶段西方理论模型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我国健康传播研究仍然缺乏中国理论意识^⑤, 即中国本土化的健康传播理论发展与创新。未来我国学者也应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体现的健康实践, 并在理解健康传播过程的背景下推进经验的理论化。

① Gary Kreps, 陈怡宁, 陈韬文. 科技整合与社群导向的健康传播[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1(17): 1-18.

② 闫婧, 李喜根. 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关照、模型构建与创新要素[J]. 国际新闻界, 2015, 37(11): 6-20.

③ 孙少晶, 陈怡蓓. 学科轨迹和议题谱系: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三十年[J]. 新闻大学, 2018(3): 84-97, 150.

④ 闫婧, 李喜根. 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关照、模型构建与创新要素[J]. 国际新闻界, 2015, 37(11): 6-20.

⑤ 周裕琼, 尹卓恒. 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国意识: 中外发展比较与评析[J].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9(1): 112-128.

五、面向未来的中国健康传播研究

围绕现有的研究进程，立足于当下的国情现实，可以提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面向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其一是立足“十字路口”，坚持学科融合与理论创新。施拉姆曾将传播学比作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十字路口”，认为人人皆可从“传播学”这一十字路口穿行而过，却不会有人为此驻足停留。幸运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率先将公共健康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围绕艾滋病预防、防止药物滥用等现象开启了“健康传播学”研究^①，从“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为了健康”的研究共识出发，打开了传播学理论研究新方向，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将传播学与公共卫生、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形成跨学科的健康传播研究团队。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新的健康问题不断出现，如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环境健康等，未来也应持续关注新兴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鼓励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研究视角和深入的社科洞察。

其二是着眼“健康促进”，强化技术驱动与应用探索。健康传播学理论最扎实的落脚点是能够促进个体健康的“行为”^②，因此，健康传播研究也需要持续保持对个体和群体行为改变的关注，探索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策略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和持续。尤其是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更迭发展的当下，亟需深入探索媒介技术、科技创新在健康信息传播、健康教育、疾病预防等方面的应用，以及对健康传播效果的影响。例如，关注技术在健康监测、疾病预防、远程医疗等方面的应用，以及这些新兴技术如何改变传统的健康服务模式。同时，也不能忽视“组织”对于健康促进的重要推动作用，未来应将部分研究视线投入到基层社区，探索社区层面的健康传播策略、鼓励和促进公众参与健康传播过程，通过社区、村镇等基层一线切实提升健康促进效果。

其三是心怀“国之大者”，平衡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既要拓展国际视野、关注全球健康治理，也要注重本土化策略，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特点，发展适合国情的健康传播模式和实践。在国际研究中，注重“求同存异”、保持文化敏感性，积极寻求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共同应对传染病防控、慢性病管理等全球性健康挑战。在国内研究中，考虑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健康传播差异，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健康传播策略。比如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指导下，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文化特点和吸烟人群的行为习惯，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控烟策略。

① 王一帆，曹博林. 国际健康传播的理论进阶：现状、趋势与困境（2008—2018年）[J]. 新闻春秋，2020（5）：73-81.

② 闫婧，李喜根. 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关照、模型构建与创新要素[J]. 国际新闻界，2015，37（11）：6-20.

健康传播研究方兴未艾。相比于国外的日益成熟，国内仍处在探索阶段，但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以及微观群众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下，以追求“美好生活”为己任的健康传播研究在公民健康素养提升、健康行为促进、健康决策制定，以及医患关系构建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也在不断被“再认识”。面向未来，只有“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才能在健康传播研究异常繁荣的大背景下，保持足够的清醒，怀敬慎之心、破除西方学术霸权，也才能为我国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实现社科研究的应有之义。